

紫苏

郑振铎先生的温州情缘



瓯江晨曦,云雾缥缈,片片帆影,自远处迤邐而来。天色渐渐明朗,一个背着书包的少年,步伐坚定地行走在瓯江南岸崖盖山的小道上。这位少年,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界“全才大师”的郑振铎。在文学、史学、艺术学、编辑学、文献学等众多领域,先生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生于温州 长于温州

120多年前,温州城是一个河网密布的水城,悠长的河道四通八达,低矮的房屋沿河而建,乌黑的小船穿行其间,犹如东方威尼斯。1898年12月19日,郑振铎就出生在温州城乘凉桥附近的老衙署“盐公堂”。郑振铎籍籍福建,“振铎”的名字是在温州任盐官的祖父给起的,寓意摇铃发出号召,一呼百应,寄托了祖父对长孙未来成才的期盼。

郑振铎还有一个小名“木官”,这个名字和温州的山水一起伴随他度过了童年。郑振铎十一二岁时,父亲病故,没过几年祖父也去世了,家庭骤然变得贫困。兄妹三人加上年迈的祖母,一家五口的生活重担全落在郑振铎母亲的肩上。她日夜做针线活,靠微薄的收入和亲友的接济过活,度日如年。但不论生活如何艰苦,母亲却一定要供郑振铎读书。郑振铎先是在一家私塾念书,后来转入三官殿巷永嘉第一高等小学就读,费用全靠母亲东挪西借。上小学时,因家境贫寒,冬天里郑振铎也只穿单薄的衣衫,因此长期受冻得了慢性鼻炎,时不时挂下两行鼻涕,受到同学的嘲笑,不爱与他玩耍,郑振铎于是常默默地坐在学校的角落读书。

当时永嘉第一高等小学校长黄小泉兼教学校的国文课。黄校长虽然是旧式科举出身,却思想开明,对学生非常爱护。郑振铎最喜欢上小泉老师的课,小泉老师也对聪敏好学的郑振铎格外关心。学校附近的积谷山、春草地、飞霞洞等都是温州名胜,小泉老师不仅会带着郑振铎等学生去游玩,还乐于把自己的书刊也借给郑振铎阅读。如此教导下,郑振铎的国文进步很快,不久便开始尝试写新式作文。后来,郑振铎还写过一篇《记黄小泉先生》,其中有“我永远不能忘记黄小泉先生,他是那样的和蔼,忠厚,热心,善诱”,“假如我对文章有什么一得之见的,小泉先生便是我真正的启蒙先生,真正的指导者”等深情的句子。

今日之温州,高楼林立,商铺云集,大街小巷都是匆忙的行人和汽车。盐公堂和乘凉桥早已

被拆除,郑振铎童年、少年活动的蝉街、沧河巷一带河道早已被填平,也成为了温州老城区的繁华地段。永嘉第一高等小学多次易名,校舍几经拆建,于1978年更名为温州市广场路小学至今。不过,乘凉桥作为温州市区的一个地名却保留了下来。2013年,温州有关部门根据郑振铎在“五四”时期永嘉新学会通讯录的“住址”一栏中曾填写过“沧河巷”,便选择在沧河巷宅建成郑振铎纪念馆,这距离郑振铎1958年10月17日因飞机失事遇难已过去了55年。

说温州话 吃温州菜 交温州友

温州蕴含着丰富的瓯越文化,衍生了“敢为人先,特别能创业”的温州人精神,也造就了郑振铎奔走四方、敢想敢干的性格。

1917年春,郑振铎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今温州中学)毕业,1918年1月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方交通大学)学习。1921年春郑振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上海沪杭甬铁路管理局工作,同年5月,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不久便将母亲及家人接到上海生活,从此郑振铎便再也没有回过温州。

喝着瓯江水长大的郑振铎熟悉温州话,也有一个“温州胃”。据郑振铎之子郑尔康回忆,无论在北京还是上海,凡家里有温州人来访,父亲总爱用温州话与他们交谈。与郑振铎常有往来的温州文化人中,有夏承焘、周予同、陈仲陶、夏鼐等。他们说着温州话,吃着温州菜,喝着杨梅酒,叙说着家乡事;他们的情谊像瓯江水,奔流不息,激起浪花朵朵。

被称为“一代词宗”“词学宗师”的夏承焘比郑振铎小两岁,两人曾是同窗好友,少时是要好的玩伴。1978年,夏承焘怀念已经亡故20周年的郑振铎,写下了《减字木兰花·有怀西谛学兄》一词,回忆两人七八岁时一同就学的情景:“峥嵘头角,犹记儿时初放学。池塘飞霞,梦路还萦绕永嘉……”

郑振铎与中国经学史专家、复旦大学教授周予同同龄,关系密切。在《回过头去》一文中他这样描写周予同:“予同,我们同伴中的翩翩少年,春二三月,穿了那件湖色的绸衫,头发新理过,又香又光亮,和风吹着他那件绸衫,风度是多么清俊呀”。而周予同则这样描述郑振铎:“振铎是我们的朋友中生命力最充沛的一位”,“概括地

说,他的学术范围包括文学、史学和考古学……但他的精力异常充沛,好像溢满出来似的,学术部门实在圈不住他”。

郑振铎在浙江省立第十中学读书时,最要好的同班同学叫陈召南。陈召南的父亲陈寿宸是清末举人,博学多才,当时正在第十中学教习国文。郑振铎还认识陈召南的三哥陈仲陶,陈仲陶办过刊物,组织过诗社、词社,精通诗词,为南社诗人。郑振铎与陈家父子特别亲近,陈家有很多藏书,郑振铎经常前去看书,时常看到忘我的境地。五四运动之后,郑振铎从北京回到温州,与陈仲陶等人一起在华盖山资福寺创办《救国讲演周刊》,传播新文化、新思想。1951年,时任文化部文学研究所所长的郑振铎,邀请陈仲陶赴京校编《宋诗选》,后陈仲陶因病未能成行。

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夏鼐比郑振铎小12岁。1949年11月,郑振铎担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兼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力邀正在浙江大学当教授的夏鼐到北京主持考古工作。1950年7月,夏鼐应邀北上,担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此后两人共事8年,风雨同舟,情深谊厚。

如椽之笔抒写温州情

在温州,郑振铎度过了人生最初的20年,后来,这20年里的许多记忆幻化成了他笔下的文字,如小说《五老爹》《家庭的故事》,散文《宴之趣》《记黄小泉先生》等。

在短篇小说集《家庭的故事》序言中他写道:“我写这些故事,当然未免有几分眷恋……他们并不是我自己的回忆录,其中或未免有几分是旧事,却绝不是旧事的纪实……”集子里的小说,有的写于五四运动后,表现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困惑与情趣;有的写于1927年他旅居巴黎时,反映了旧中国封建大家庭的状况与困惑,小说里人物的原型也大都生活在温州。郑振铎的舅公也被他写进了小说,舅公经常说“三国”故事给“小木官”听,培育了郑振铎最初的文学素养。

郑振铎在散文诗《雁荡山之顶》里写道:“红的白的杜鹃花,随意在山径旁开着。我迎着淙淙的溪声,上了瀑布之顶——雁荡山之顶……”年少时游览温州雁荡山的经历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1932年10月,郑振铎在北京大学作学术报告时曾说:“回想儿时居乡,合村公请一盲者宣卷,远近咸至,返家竟相转述,当时情绪之激涨,今犹历历如在目前。”这反映了温州民间讲唱文学对郑振铎童年的诸多熏陶和影响。在他自己编著的《中国文学论集》序言中郑振铎还写道:“年十三四时,读《聊斋志异》,便习写狐鬼之事。记得尝作笔记盈半册,皆灯前月下闻之于前辈长者的记载。迄未敢出示友朋。人亦无知之者。几解播迁,皆落为云烟矣。后随长者们作诗钟。方解平仄,乃亦喜赋咏物小词。随作随弃,也不复存稿”。所谓“随长者们”作诗钟,“长者”主要就是陈寿宸先生。

郑振铎是中国文坛上的多面手,于文学艺术的许多门类都有杰出贡献。可以说,先生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奉献了一生,是后来者的楷模。

“小燕子带了它的剪刀似的尾巴,在阳光满地时,斜飞于旷亮无比的天空,唧的一声,已由这里的稻田上,飞到那边的高柳下了。另有几只却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横掠着,小燕子的翼尖或剪尾,偶尔沾了一下水面,那小圆晕便一圈一圈地荡漾开去……”这是郑振铎远离祖国,心中泛起乡愁时写下的传诵至今的经典文句。小燕子掠过波涛起伏的瓯江浪头,留下了永恒的印迹。

马小孚

莫洛:当我不再醒来的时候,也许我正走进诗的王国



莫洛(1916~2011),原名马骅,浙江温州人。曾出版有诗集《叛乱的法西斯》《渡运河》《风雨三月》,散文诗集《生命树》《梦的摇篮》《大爱者的祝福》等。诗,是莫洛的生命,也是他理想的生存方式。在莫洛心目中,生活本应富有诗意;而写诗就是追爱、播撒爱,并通过爱探求真善美。

莫洛经历过血雨腥风的年代。作为一位爱国热血青年,他把自己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在一起,义无反顾地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曾领导学生风潮,创办进步刊物,组织战时青年服务团,奔赴苏北抗日前线……与此同时,诗歌始终陪伴着莫洛。诗的灵光照耀着他,诗的理想鼓舞着他,诗成为他人生历程的真实写照。莫洛同时生活于现实和诗这两个世界。他既脚踏实地参与现实的斗争,沉稳坚定地做着救亡工作,又在工作之余,旅行间隙,于片刻的休憩之时进入了另一个诗的世界。在莫洛的一生中,这两个世界始终是相互支撑、相互辉映的。诗人以诗的理想和境界来对照、勉励人生,又切实地将人生体验融入诗的世界,从而成就了他富有意义的人生之路和独特的诗歌创作。

在莫洛的人生中,苏北抗日根据地之行曾为

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次险情四伏、历尽磨难的行旅同时也是他的精神之旅、理想之旅,激发了诗人蓬勃的创作热情。《枪与蔷薇》《晨颂曲》《陈毅同志》《炊事员》《战马》,长诗《渡运河》《山店》《母亲》,组诗《月亮照在江南》《我们渡过长江》《风雨三月》等诗篇,其灵感均来自于这一段经历。

在长诗《渡运河》中,主人公“我”出于爱和热情,燃烧着青春烈焰奔向运河。这不是为了探访运河古老的故事,也不是为了倾听怨愤的诉说。运河作为祖国和人民的象征,与“我”的命运休戚相关,“我”理应为涤除耻辱、捍卫运河而战。诗人以丰沛的感情,依次展开了“奔向运河”“运河边上”“早安呵,运河”“渡运河”“在运河彼岸”“离运河”等六个“乐章”,交织成一首气势磅礴的英雄史诗,凸显出抒情主人公“我”和运河的丰满形象:

冬夜,“我”来到运河边上,像“病瘦的老猫”孤独地蹲在堤边的茅舍里,“火油灯缭绕着黑烟/混搅着羊骚的气味”……被惊醒的女人抱着孩子,挤在男人中间,“用胆怯而畏缩的目光/凝看我这生疏的远客”;而亲热的笑声顷刻间融化了



隔阂,“在兴奋的谈话里/他们已经向我/亲切地称呼‘同志’了……”

清晨,“我”踏上运河的堤岸,“我伸手在水里/试探河水的冰凉/像抚摸少女的面颊/河水漾起波纹/张开娇美的感激的眼睛/她亲切地,嫣然地/笑了……”

诗人深深扎根于现实,将一腔热爱凝缩于细腻的感觉,将浩荡的激情熔铸于生动的现实图景和烂漫的想象之中,升华结晶为诗的意境;而记载着久远历史、驮负着深重灾难的运河,则又赋予诗作以历史的厚重感和阔大的象征意蕴,构成了现实与历史、写实与象征、有限与无限的交响。《渡运河》是一种纯情的抒写,尽管全诗长达六百余行,却浑然天成、深厚淳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独特价值。长诗写于1941年4月8日盐城袁家河,据诗人自己回忆,当时一气呵成,几乎没作任何改动。而诗作真正面世则是在1948年5月,由《森林诗丛》收入,星群出版社出版,后又入选瑞典汉学家马悦然(Goran Malmqvist)主编的《中国文学选读指南(1900—1949)》。

纵观莫洛的整个创作生涯,前期显然以抒情诗为主,其后则逐渐转向散文诗创作。时代风潮的涤荡冲击、传奇生活的强力吸引和投身斗争激流的切身经历,都使莫洛不能不以诗歌来抒发炽烈、绵长的情思。而1942年之后,由于身陷沦陷区,与直接的战斗相隔绝,孤寂苦闷的生活让诗人有了更充裕的时间以及更迫切的愿望来审视和拷问内心,于是,散文诗的创作也就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了。散文诗长于捕捉心灵的微动并反映智慧的哲思,与莫洛的天性更为契合,因此这种体裁逐渐成为诗人主要的抒情写作方式。

在莫洛的散文诗中,有脚踏蓬头,把自己血红的心理进土穴,播撒爱的种子的“播种者”;有背着“责任”的行囊,风霜雪雨永不休止地走向不可知远方的“投宿者”;有站在神秘的门外,固执地拷问灵魂的“诘问者”;还有穿行在荒凉的夜野,求取点燃思想“火种”的“取火者”……一个个生动的形象,凝聚着诗人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思考。

散文诗组诗“叶丽雅”和“黎纳蒙”写于1947年初。其时,《浙江日报》因抗战胜利自丽水迁至杭州后被当局接管,担任副刊编辑的莫洛失业,一家八口蜗居在6平方米的小屋里,每当夜深人静,他才能在昏暗的灯下开始写作。窘迫的生活并不能拘囿思想的飞翔,反而催生了“叶丽雅”这一春光灿烂的少女形象:“雪已经融化,太阳已经出来,叶丽雅,天色不会再阴黯无光。出来走走,叶丽雅,把你的脸朝向阳光,把你的心朝向阳光,像那些初春的花木一样,把你的喜悦洒向阳光。”诗人热情召唤阳光般纯净的少女,领她走进春阳铺洒的晴野,去领悟自然的生命启示。在诗人笔下,叶丽雅就是“我”,就是初春的大自然,是生命,是爱,是人生理想。

这是纯情的自然流泻,是无技巧的技巧,它不事雕琢地将生命化入一个整体象征之中。很难想象,在靠食粥度日的潦倒困窘中,竟能孕育出如此明丽、舒展的诗篇。在组诗“叶丽雅”写了几篇后,莫洛开始构思创作另一组散文诗“黎纳蒙”。叶丽雅太纯真的,诗人不忍心将过分阴暗的人生和沉重的思考加诸她身上;而青年黎纳蒙是深沉、忧郁的,他无情剖露出一代知识分子深刻的内心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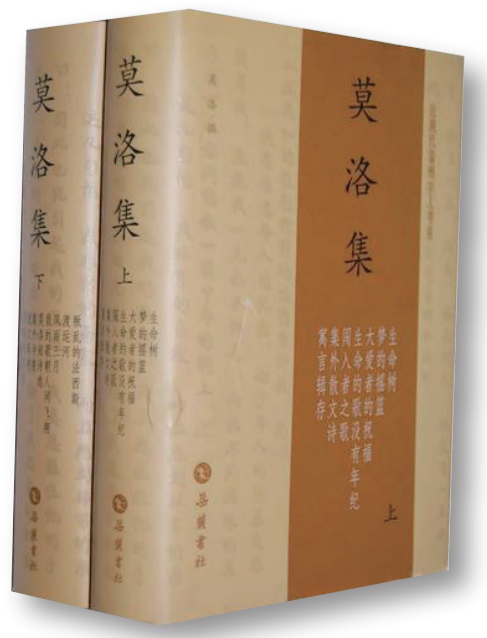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初,在沉寂了30年后,莫洛

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属于他的世界。“一天,我独坐室内,双目微闭,呼吸平匀,浮动的思想慢慢沉淀下来。这时,我在似梦非梦之中,出现了幻觉,仿佛觉得诗精灵突然重访我。我一觉惊醒,失去的幻觉仍历历在目。于是我便把这幻觉,用文字描在纸上。”复归文坛后的莫洛,第一首散文诗就是《幻觉》:

一个春雨过后的黎明,披着雾般薄纱的诗精灵无声地来了。“她好像要对我说什么话,然而却没有说出来;又好像要对我唱什么歌,然而却没有发出歌声。”30年的漫漫岁月足以抹去人的记忆,令歌喉哑哑,令诗情熄灭,而莫洛却重新开始了他的歌唱。

莫洛的心胸是开阔的。他关爱着麦田里劳倦而安谧的“吹麦笛老人”;赞美着按心灵的节拍,教孩子诵读诗歌的“山村女教师”;同情又鞭挞那扮演帝王、将军、学者、慈善家、骗子等各种角色,在灵魂离开肉体后不再认得自己的“假面演员”;甚至是草木虫鸟,都能拨动莫洛的心弦,引发绚烂、遐远的诗思。他思考着什么是富有,什么是满足,什么是真理,什么是幸与不幸;他倾听着生命的微语和自己灵魂的沉吟;他歌唱着暮年情歌并怀念着初恋的记忆;他叩响沉睡的窗口,努力唤醒酣梦中的人们……是的,在“季节交替的时刻”,莫洛是个辛勤的耕种者,他的心是一片孕育诗篇的“沃土”。

莫洛自称“诗国的流浪汉”。他的衣袋中空无一物,背囊里仅有一卷诗、一束稿、一支笔。可他又是最富有的人,享有无边无垠的金色王国。他那些写在“绿叶上的诗”,仍将自晨至暮,自春至冬,经受着春阳、夏雨、秋风与冬雪……



欢迎关注中国作家协会网 www.chinawriter.com.cn 本专刊与中国作家协会网合办